

中国生态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

郑继承

【摘要】生态扶贫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生态扶贫经历萌芽、探索、成熟三个演进阶段,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生态扶贫制度体系,在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绝对贫困的终结,相对贫困的伊始,中国反贫困事业进入后扶贫时代。论文从理论层面分析生态建设与贫困治理的内在联系,从实践层面剖析生态扶贫的创新性探索,能够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为中国生态扶贫科学有序推进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生态扶贫;理论演进;后扶贫时代;战略转型

【作者简介】郑继承,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E-mail:jiczheng@163.com(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生态经济》(昆明),2021.8.193~19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安全稳定新态势及风险防范研究”(19BKS083);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研究”(2020104);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发展阶段云南社会建设重点问题研究创新团队”。

贫困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纵观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83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空间分布,大部分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区、特殊生态敏感区、自然灾害频发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区域性整体贫困叠加在一起,经济快速发展引致资源掠夺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致使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陷入“经济发展滞后—区域性贫困—生态环境恶化—经济难以良性提升—贫困继续恶化—继续生态恶化”的恶性循环模式。基于这一客观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指导下,国家启动生态扶贫工程,将贫困问题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生态扶贫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生态建设与贫困治理的内在联系,从实践层面剖析生态扶贫的创新性探索,能够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为中国生态扶贫的科学有序推进提供理论支撑。

1 研究缘起与理论述评

贫困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消除贫困是一

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多位经济学家因贫困理论研究的突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世纪90年代末,理论界开始关注生态文明建设与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在联系,直到2015年“生态扶贫”概念正式提出后,关于生态扶贫的理论研究才开始进入系统化。现阶段,基于生态视角来研究阐释贫困现象的成果还相对较少。

具体来看,围绕“生态扶贫”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6个方面:(1)关于“生态扶贫”概念内涵的界定。“生态扶贫”一词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刊发的《生态扶贫(新词·新概念)》,将生态扶贫界定为:生态扶贫,是指从改变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入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使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的扶贫方式^[1]。这一概念性阐释为学者进一步探讨“生态扶贫”的概念内涵奠定了理论基础。李广义^[2]认为,应该从生态文明视角来界定“生态扶贫”的范畴;黄金梓^[3]基于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视角提出“精准生态扶贫”的概念;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维度对“生态扶贫”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但目前理论界

对“生态扶贫”的概念尚未统一。(2)关于生态与贫困的关联性研究。李周和孙若梅^[4]统计得出,中国生态脆弱区中有75.92%的县份为国家级贫困县,67.96%的耕地面积处于贫困区域内,75.86%的人口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王晓毅^[5]针对生态、贫困和扶贫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较为系统的论证;万健琳和杜其君^[6]从经济、生态与民生的耦合路径维度解析了生态扶贫的内在逻辑。(3)关于生态产业扶贫体系建构的研究。刘慧和叶尔肯·吾扎提^[7]从生态产业发展的维度提出构建生态化产业体系,具体涵盖低碳工业、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三大模块。(4)关于生态补偿式扶贫的研究。徐丽媛和郑克强^[8]运用博弈论对“生态补偿式扶贫”进行论证,认为做好生态补偿式扶贫需要从思想观念、机制建设、资金支持等方面构建起有保障的长效机制。(5)关于生态扶贫绩效评估的研究。张涛等^[9]围绕“生态移民综合效益评价”构建出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贾耀锋^[10]从微观层面对生态移民评估对象、评估区域、评估内容和评估方法进行系统的概述。(6)关于生态扶贫模式的理论探究。胡振通和王亚华^[11]系统阐释了生态扶贫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路径;雷明^[12]将生态扶贫的模式划分为原地生态扶贫模式和易地生态扶贫模式两类;史玉成^[13]从类型化视角将生态扶贫模式归纳为生态补偿扶贫、生态建设扶贫、生态产业扶贫;王萍和杨敏^[14]提出构建新时代农村生态扶贫的“政府—社会—市场”多元协同机制。

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关于生态扶贫的理论研究更多是侧重于微观现象解释层面,围绕生态扶贫的逻辑结构、价值内涵、基本范式、战略转型等理论研究还相对不足。因此,立足于中国贫困治理重心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的历史新方位,系统深入研究中国生态扶贫理论与实践问题十分必要。

2 生态环境与区域贫困的逻辑关联

生态环境与区域贫困之间的逻辑关系不仅是一个复杂的认知问题,更是一个动态多面的客观现象。由于区域生态环境的不断退化,区域内人群的基本生计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由此产生贫穷^[15]。对于贫困群体而言,其生存方式长期依赖自然资源,围绕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而贫困群体却无力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治理,于是就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持续性恶化与区域内人群持续性贫困的恶性循环^[16]。由此可见,

生态环境与区域贫困之间存在一定时间和空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亦称之为耦合关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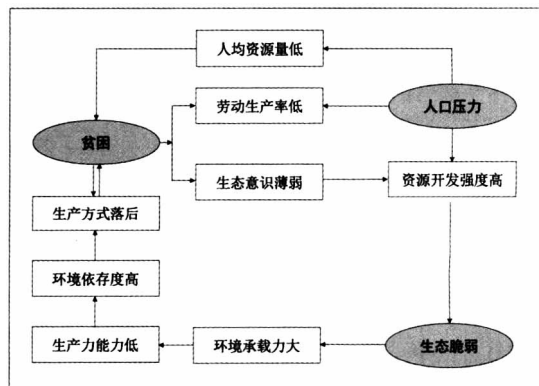


图1 生态环境与区域贫困的逻辑关联

2.1 区域贫困与生态脆弱的空间重叠

从空间地理分布来看,生态脆弱区与集中连片特困区呈高度重叠性,贫困群体多分布于生态脆弱区划范围内,生态脆弱区涵盖了80%以上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832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中,有232个县为生态极强脆弱县、313个县为生态强度脆弱县,55个县为生态中度脆弱县;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80%的区域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区、特殊生态敏感区、自然灾害频发区。如地质灾害频发的滇桂黔石漠化区。

贫困表现为经济发展迟缓落后,生态脆弱表现为生态退化。基于地理空间解析的视角来看,大部分经济落后地区和生态退化地区高度重合,区域内整体贫困与生态脆弱深度叠加。这种叠加现象,将区域性贫困与生态脆弱联系在一起,形成生态脆弱性与生态贫困性的结构性特征,以及由这种结构性动态变化所引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2.2 区域贫困与生态脆弱的耦合关系

就贫困地区而言,生态退化源于粗放型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内居民对基本生活必需品(诸如粮食、能源燃料、建筑材料等)的需求只能单纯向大自然索取,以此作为维持基本生活和发展的单一选择。具体来看,主要通过广种薄收、无序滥垦等方式维持基本生活需求,这种方式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平衡造成巨大压力,导致区域生态日益脆弱,自我恢复能力逐步下降。目前,中国90%的草原地区均为生态脆弱地区,无序开垦、过度放牧和忽视草原的环境承载力等一系列因素,导致草原退化越来越严重、环境承载力越来越弱。同时,贫困地区大部分处于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民族地区,居

民整体文化程度相对偏低、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相对较窄、生态保护意识相对不足,导致居民对大自然生态系统破坏的认知不足,使得贫困地区的生态资源愈来愈敏感、愈来愈脆弱。

2.3 区域贫困与生态脆弱的动态逻辑

生态脆弱区的资源短板对地方经济发展构成了强约束,在很大程度上也降低了地区发展的承载能力。由于在生产生活中忽视对大自然的保护,打破了生态系统原有的平衡,致使很多地区生态环境变得十分敏感,石漠化地区持续外延、泥石流灾害剧增、病虫害频发,这些由生态系统引发的灾害对当地居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中指出,中国生态脆弱区每年因沙尘暴、泥石流、山体滑坡、洪涝灾害等各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2000 亿元人民币,自然灾害损失率年均递增 9%。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文化资源保护区域和需要特殊保护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均作为禁止开发区,60% 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为禁止开发区。

3 中国生态扶贫理论演进与实践路径

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载体。正如马克思^[17]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自身的和解。生态扶贫伴随着人类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认知深化而诞生,并在国家宏观战略动态调整中发展成熟。

3.1 中国生态扶贫理论演进

纵观中国 70 多年的反贫困史,生态扶贫由初步探索走向发展成熟,经历了萌芽、探索、成熟三个阶段,形成了科学系统、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中国特色生态扶贫理论体系。

(1) 萌芽阶段(1949 - 197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倡导“植树造林绿化祖国”。1958 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18]。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随之出现。1973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提出“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方针,由此开启了中国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历史先河。这一时期,国家提出

的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思路,为后期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2) 探索阶段(1973 - 2012 年)。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问题逐渐暴露。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生态保护、生态安全、生态建设、生态农业等概念,倡导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思路。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思路和党的十七大“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的确立,生态文明成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形成集约型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特别是贫困地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纳入国家总体战略,生态扶贫的概念开始形成,生态扶贫理论开始建构,逐步探索出以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生态补偿、生态产业为核心的生态扶贫模式。

(3) 成熟阶段(2013 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绿色发展理念和扶贫开发重大战略,并从生态与经济、生态与生产力、生态与民生维度揭示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与脱贫攻坚的逻辑联系。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扶贫开发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探索生态脱贫新路子,让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的思路。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加强生态扶贫,创新生态扶贫机制,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实现生态改善和脱贫双赢。在国家宏观战略指导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财政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制定了《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明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扶贫发展理念,通过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创新生态扶贫方式,推动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促进,使贫困人口从生态保护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同时,生态环境部也出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助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围绕生态扶贫的基本思路、主要形式、战略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整体性部署。由此,中国生态扶贫形成了科学系统的宏观战略和微观政策(下页表 1),标志着生态扶贫理论由实践探索走向成熟。

表 1 中国生态扶贫的政策架构

	政策文件	具体内容
宏观战略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扶贫开发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探索生态脱贫新路子,让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加强生态扶贫,创新生态扶贫机制,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实现生态改善和脱贫双赢
微观政策	《生态扶贫工作方案》	以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为准绳,以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促进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助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	集中力量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协同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促进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从生态环境保护中稳定受益,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扶贫大格局

3.2 中国生态扶贫的实践路径

生态扶贫的实践路径以生态资源的多层次利用为先决条件,通过基础层、产业层和服务层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和培育生态服务市场,形成以绿色为导向的生态产业链。

(1)基础层。生态扶贫的基础层,表现为在生态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性扶持。其核心是通过组织贫困人群参与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常态化将贫困人口聘任到生态公益性岗位参与生态区域的日常管护,探索生态保护补偿的合理化模式,帮助贫困群体获得劳动报酬,增加贫困群体整体性收入。在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架构中,针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是涉及面最广、实施力度最大、资金投入最多的扶贫项目,也是实施效果最好、带动能力最强、贫困群体增收最明显的扶持措施。

(2)产业层。生态扶贫的产业层,表现为绿色发展理念对生态资源使用价值的市场化开发所形成的生态产业。按照绿色发展的市场化需求,依托贫困地区优质的生态资源禀赋,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产业,打造具有地域优势的生态产品,带动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推动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具体来看,生态扶贫战略结构的产业层主要涉及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林下产业,通过林地流转、合作经营、入股分红、订单帮扶等多种形式,形成集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体为一体的利益联结机制,以此拓宽贫困人群的增收渠道。

(3)服务层。生态扶贫的服务层,表现为依托生态资源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功能所形成的消费结构。基于最终产品的结构类型,生态产品不仅包括取之于自然生态实物资料的生产性服务功能(如木料、药材、油料等),还涵盖了环氧水源、碳储

存、气候调节等生活性服务功能。由生态产品的生活性服务功能所形成的消费市场是生态扶贫的核心关键,推动生态扶贫从生态建设项目扶贫向生态产品消费扶贫的升级。

3.3 中国生态扶贫的主要成效

经过萌芽、探索、发展三个阶段的演进,中国生态扶贫基本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与主导模式。特别是《生态扶贫工作方案》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生态扶贫取得显著的成效,生态环境脆弱区、特殊生态敏感区、自然灾害频发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贫困群体整体性收入水平大幅提高。

(1)初步建立生态扶贫的制度框架。从整体维度上看,中国已经建立科学规范、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生态扶贫制度架构。从战略维度来看,中国生态扶贫政策架构,既包含宏观战略层面的制度设计(诸如《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又包含实践探索的操作指引(诸如《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助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

(2)贫困地区生态产业初具规模。生态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按照地方特色和品牌优势,帮助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森林旅游、林下经济、木本油料等生态产业,并与旅游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等专项扶贫深度融合,形成较为成熟的生态产业市场和产品业态。截至 2019 年,在生态扶贫战略指导下,中国建设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370 家,生态产业总产值达到 4.26 万亿元^[19]。

(3)生态治理能力显著增强。自 2016 年以来,中国生态扶贫覆盖全国 22 个省份,推动了一批重大生态建设项目,诸如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湿地保护与恢复等。贫困地区林草植被面积持续增加,水土流失和沙化土地显著降低。同时,

区和生态敏感区修复的基础性条件,贫困治理的持续性推进是确保贫困群体由摆脱绝对贫困到发展致富的有效途径。后扶贫时代生态扶贫必须立足于长远发展来进行顶层设计。一方面,生态建设的持续性推进是贫困治理的基础保障,只有将贫困地区的生态保护好、建设好、利用好,贫困群体的发展才会有保证,贫困人口脱贫才能可持续;另一方面,贫困治理的持续性是生态建设的基础条件,只有改善了贫困地区发展条件,贫困群众才有脱贫致富的机会,生态环境才能被更好地保护。

4.3 后扶贫时代生态扶贫的理论建构

立足于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的视角,后扶贫时代生态扶贫应该按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总体需求,构建生态扶贫大格局、形成生态扶贫大循环、打造生态扶贫大市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阶段。

(1)构建生态扶贫大格局。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态扶贫大格局建构,不仅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还应依靠“有效市场”的活力,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促进”的有机整体。基于政府维度,继续发挥高效的主导性作用,建立完善生态扶贫的政策体系、投入体系、责任体系和监督体系;基于市场维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在贫困地区建立绿色型生态产业链。

(2)形成生态扶贫大循环。后扶贫时代生态扶贫应该打破传统分布式的理论逻辑,强化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形成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大循环结构。从横向维度来看,生态扶贫应加强与旅游产业、农产品种植业、林业经济等业态的深度融合,成为绿色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从纵向维度来看,生态扶贫应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制订战略规划,明确生态扶贫的推进思路和阶段性目标,形成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整体性均衡;从外部维度来看,生态扶贫应主动融入科技化、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浪潮,充分利用电商平台、冷链物流、直播媒体等现代化载体,形成绿色发展的积极外部影响。

(3)打造生态扶贫大市场。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如期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也将发生重大转变,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品质。顺应绿色发展理念,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将更加注重绿色、环保、无污染,精神生活将更加倾向本源、归真、原生态,由生态食品、生态旅游、生态环境组成的消费产品新业态将具备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因此,

生态产品市场业态的建构尤为重要,通过生态扶贫理论建构生态产品大市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地区经济发展互促共进。

4.4 后扶贫时代生态扶贫的实践范式

生态扶贫是破解“生态型贫困”困局的制度建构,将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有机结合,实现“生态保护+贫困治理”的双赢效果。纵观中国生态扶贫的理论演进,经历了由地方自主探索到中央的认同肯定,再到全国推广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生态脆弱地区因地制宜探索出不同类型的反贫困模式,演变为生态扶贫的实践范式。

(1)补偿型生态扶贫。生态补偿是生态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贫困群体增加收入最直接的方式。从价值层面来看,生态补偿体现了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价值的重要性;从成本层面来看,生态补偿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生态提供者提供生态服务的成本。同时,生态补偿政策作为环境外部性成本内在化的有效手段,还承担着调节经济系统、民生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

补偿型生态扶贫探索实践过程中,云南省贡山县最具代表性。贡山县是一个以独龙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县域内 55.6% 的地域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1 年全县贫困发生率高达 74%。2016 年以来,贡山县通过启动“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工程,从全县 3679 户建档立卡户中按照“一户一名”的标准评选聘用 2000 名生态管护员,户均增加工资性收入 9600 元^[25];到 2019 年,独龙族在全国率先实现整族脱贫。

(2)产业型生态扶贫。产业型生态扶贫,即以生态为核心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基于贫困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顺应市场对绿色、生态、低碳、无污染产品海量需求的趋势,通过龙头企业主导带头、专业合作社方式运营、互联网+销售的模式,培育以生态种植、生物医药、生态林业、生态旅游为核心的生态产业链,有效解决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内生动力发展不足的问题。

产业型生态扶贫实践探索中,贵州省晴隆县探索形成的“晴隆模式”在全国具有代表性。晴隆县是中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石漠化的典型区域,喀斯特地形地貌突出,县域范围内 65% 的耕地坡度均在 25 度以上,生态脆弱与区域贫困相互交织。2006 年以来,晴隆县开始尝试以草地生态畜牧业为核心

的生态产业发展策略。到2017年,晴隆县种植人工草地48万亩(1亩=1/15公顷)、改良草地30.8万亩,让1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26]。

(3)移民型生态扶贫。移民型生态扶贫,即通过将影响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群体迁出生态脆弱区和生态敏感区,避免因居民生产生活给生态系统带来更重的负担,实现居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的共赢。具体而言,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迁出居住在生态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生态脆弱区、生态敏感区的群体,腾出更多的空间让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和可持续发展,推动移民搬迁、生态保护、脱贫致富有机融合。

从全国移民型生态扶贫的实践看,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的“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扶贫工程”效果十分显著。宁夏中南部地区涵盖8个贫困县(即同心县、盐池县、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海原县),区域内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失衡明显。2005年,宁夏启动“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扶贫工程”,力图通过生态移民为生态区域修复创造条件;到2015年,生态移民搬迁安置7.2万户,生态修复土地面积182万亩,实现了区域内31万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27]。

(4)修复型生态扶贫。修复型生态扶贫主要是针对荒漠化、石漠化、过度垦殖、过度牧养和过度砍伐的环境脆弱区,以治理退化生态环境和生态修复工程为核心,培育低碳产业和探索碳汇交易,推动生态建设重点区域和高强度区域经济进入绿色发展的轨道,以此带动区域内贫困群体增收致富。

甘肃省实施的《精准扶贫生态环境支持计划实施方案》是修复型生态扶贫的典范。甘肃省域内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面积大、植被覆盖率低,且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全省86个县(县级市、市辖区)中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高达58个。2015年以来,甘肃省出台《精准扶贫生态环境支持计划实施方案》,提出以土地整治、地质灾害综合治理、林业生态保护、草原生态保护等生态治理为核心的生态扶贫思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天然林资源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农牧交错带已垦草原综合治理等工程^[28];到2020年,甘肃省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累计治理与控制水土流失面积3733平方千米^[29]。

5 结论与展望

中国已经全面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生态扶贫基本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治理体系。从价值取向维度来看,生态扶贫彰显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总体需求;从远景目标维度来看,生态扶贫战略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基线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显著;从体制机制维度看,生态扶贫战略凸显出人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创造力与执行力,建构出多方协同推进的生态扶贫大格局^[30]。同时,更应该看到,生态扶贫助力贫困群体摆脱生存型贫困的目标容易满足,让贫困群体实现长期稳定致富的道路仍然十分艰巨。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将是后扶贫时代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展望未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审时度势地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一重要论述既是马克思贫困理论与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相结合的最新产物,也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治理相对贫困问题的总体思路。面对后扶贫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阶段性转轨,接续推进生态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将生态扶贫内嵌于乡村振兴战略框架,既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需求,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直面相对贫困所表现出来的隐蔽性、差异性、长期性、动态性等特征^[31],生态扶贫也将迎来更高层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型。

参考文献:

- [1]罗侠,杨波,庞革平.生态扶贫(新词·新概念)[N].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2-10-28(01).
- [2]李广义.基于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天峨县域经济发展[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2(8):25-28.
- [3]黄金梓.精准生态扶贫刍论[J].湖南农业科学,2016(4):103-107.
- [4]李周,孙若梅.生态敏感地带与贫困地区的相关性研究[J].农村经济与社会,1994(5):49-56.
- [5]王晓毅.精准扶贫与驻村帮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3):56-62.
- [6]万健琳,杜其君.生态扶贫的实践逻辑——经济、生态和民生的三维耦合[J].理论视野,2020(5):62-67.
- [7]刘慧,叶尔肯·吾扎提.中国西部地区生态扶贫策略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0):52-58.
- [8]徐丽媛,郑克强.生态补偿式扶贫的机理分析与长效

机制研究[J]. 求实, 2012(10): 43-46.

[9] 张涛, 袁轶, 张志良. 移民效益评估理论与方法[J]. 中国人口科学, 1997(6): 23-29.

[10] 贾耀锋. 中国生态移民效益评估研究综述[J]. 资源科学, 2016(8): 1550-1560.

[11] 胡振通, 王亚华. 中国生态扶贫的理论创新和实现机制[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168-180.

[12] 雷明. 绿色发展下生态扶贫[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5): 87-94.

[13] 史玉成. 生态扶贫: 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的结合路径[J]. 甘肃社会科学, 2018(6): 169-176.

[14] 王萍, 杨敏. 新时代农村生态扶贫的现实困境及其应对策略[J]. 农村经济, 2020(4): 34-42.

[15]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6] Duraipapp A K. Poverty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nexus[J]. World Development, 1998, 26(12): 2169-2179.

[1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国家林业局. 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19]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19年林业草原精准扶贫工作成效显著[EB/OL]. (2020-01-02). <http://www.forestry.gov.cn/ghzj/4790/20200102/085640552731584.html>.

gov.cn/ghzj/4790/20200102/085640552731584.html.

[20] 王浩. 三百万贫困人口靠生态脱贫致富: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N]. 人民日报, 2020-05-17(01).

[2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2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23] 郑继承. 批判与建构: 马克思贫困理论的逻辑理路与辩证图景[J]. 社会主义研究, 2020(6): 41-49.

[24]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25] 李寿华. 摘贫穷之帽奔小康之道——怒江州2016年脱贫攻坚综述[N]. 云南日报, 2017-02-27(09).

[26] 陈慧. 石旮晃长出绿色产业[N]. 贵州日报, 2017-04-05(016).

[27] 李军. 多措并举推进生态移民脱贫[N]. 宁夏日报, 2015-12-09(01).

[28] 孙海峰. 甘肃省全面推进生态扶贫工程[N]. 甘肃日报, 2017-06-12(01).

[29] 杨唯伟. 落实生态扶贫 助推脱贫攻坚——我省推进生态扶贫工作综述[N]. 甘肃日报, 2020-11-11(01).

[30] 郑继承.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阐释与新时代减贫战略展望[J]. 经济问题探索, 2021(1): 40-51.

[31] 郑继承. 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 经济学家, 2020(5): 91-98.

A Study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Zheng Jicheng

Abstract: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 crucial part of anti-povert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are three evolutionary stages about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 China: Germination, exploration and maturity. A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of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basically formed.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China to eradicate absolute poverty in all respects. With the end of absolute poverty and the beginning of relative poverty, China's anti-poverty cause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post-poverty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alyzes the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ractical level, whi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cientific and orderly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oretical evolution; post poverty era;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